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巩固新生政权的历史经验

赵付科

【摘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复杂形势和种种困难,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牢固确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作为思想基础,以不断提高党的执政绩效作为根本途径,以始终保持执政党的先进性作为关键环节,以努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作为可靠保障,以积极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作为重要条件,使新生的人民政权不断得到巩固。认真总结这一时期党巩固新生政权的宝贵经验,对于保持政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新生政权;历史经验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527(2011)05-0017-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权稳定问题研究》(09BKS018);山东财政学院科研计划项目。

【作者简介】 赵付科(1977—),男,山东沂水人,山东财政学院思政部副教授,中共中央编译局博士后,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一、思想基础:牢固确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意识形态是维系政权合法性的符号语言,它通过影响民众的认知、信仰和价值观念,使得民众认同、支持和忠诚于某一政权。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高度重视意识形态整合,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新中国成立伊始,党中央就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号召,要求“真正做到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来宣传马列主义,用马列主义教育人民,提高全国人民的阶级觉悟和思想水平,为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打下思想基础。”^① 为了加强全党的理论学习,党中央成立了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和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1951年2月,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对党员干部学习的内容、方法等问题做了全面的说明和具体的规定。1954年12月,党中央又作出了《关于轮训全党高、中级干部和调整党校的计划》,确立了干部轮训和学习制度。根据中央的部署,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等也都开展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运动,高等院校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相关课程。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

还开展了对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各种错误倾向的批判运动,开展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美好作了肯定性描述,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可以使中国“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② 同时,对资本主义则作了否定性评判,批判资本家的惟利是图本性,主张把它“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③。强调“资本主义私有制大大地妨碍统筹兼顾,妨碍国家的富强”^④,把个体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废除了,“整个民族只有到那个时候才更有前途,更有发展希望。”^⑤ 毛泽东通过意识形态从理论上论证了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向民众描绘了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这一方面强化了人们对新生政权的认同和支持,另一方面也使“旧社会”的负面因素显得越发难以容忍。可以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新生政权提供了“来日的合法性(forward legitimacy)”,使民众乐意“把自己的才能和力量献给国家,并使个人的目标服从于国家的需要”^⑥。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意识形态整合运动,虽然也出现了学术政治化、教育简单化、活动形式化等缺陷,但是党从“破”和“立”两个方面对当时的意识形态进行的大规模整合,使得全体人民群众都能够接受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普遍地树立起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逐步确立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为新生政权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根本途径:不断提高党的执政绩效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所以能为巩固新生政权奠定思想基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所提供的“来日的合法性”。但是如果执政绩效平平、诺言不能兑现,意识形态就很难发挥其合法化功能,因为“有效性一再丧失,或长期丧失,则会危及一个合法系统的稳定性。”^⑧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指出:如果不尽快提高党的执政绩效,“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⑨因此,不断提高党的执政绩效,通过党的有效活动,直接满足民众对现实的利益诉求,帮助民众走出现实的困境,是新生政权巩固的根本途径。在这一客观要求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为此进行了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执政绩效,从而获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党在把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实行战略转移的同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土地改革,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七百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比较彻底地摧毁了封建土地制度。党的政策为乡村中贫苦人民提供了实质性的报偿,“更公平的税制、减租、最后是分配土地(另外还给最积极的人分配领导职务),这些大大地有助于农民群众相信党的事业的正义性。由于在土改期间中共显示了它既是一支令人敬畏的力量,又是较好生活的提供者的可信性,它大大提高了将来在农民中的说服力。”^⑩为使人民群众尽快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党适时地把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面对极其困难的财政经济状况,党精心领导了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重大斗争,有效地遏制了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的局面,结束了旧中国几十年收支不平衡的局面,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对民族资本采取节制资本而不是挤走资本、消灭资本的政策,维护了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取得了民族资产阶级对新政权的支持。

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目标,是改变中国落后状态而臻于富强的关键所在。”^⑪在土地改革任务基本完成、国民经济基本恢复之后,党中央提出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和完成,国家工业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783.9亿元,比1952年增长128.3%,平均年增长18%。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改造的几年农业总产值和人民生活水平也是不断增长的。1957年农业总产值达604亿元,比1952年增长25%,平均年增长4.5%;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1957年达到102元,比1952年的76元提高三分之一强。^⑫

此外,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当一个政权在捍卫国家主权方面作出巨大贡献时,它往往能够获得人们的赞许而增强自己的合法性。”^⑬这些实实在在的执政绩效,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和认可,从而使新生政权更加巩固。泰维斯曾这样评论道:“虽然党的领导人在1957年后后期面临着大问题,但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的政绩还是非常成功的。尽管对中共的一些具体表现有不满情绪,但是政权由于在稳定社会秩序、推动经济发展、改善生活条件和恢复民族尊严方面的成绩,已得到了广泛的民众支持。”^⑭这一评价应该说还是比较中肯的。

三、关键环节:始终保持执政党的先进性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如何在执政的条件下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这项“历史上没有见过、书本上也读不到的新事业”^⑮就成为一项新的历史任务。对此,中国共产党有着清醒的认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持执政党的先进性,从而牢牢抓住了巩固新生政权的关键环节。

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各项建设是其永葆先进性的基础。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后,取得了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的条件,但与此同时也增加了党的自身建设的难度,党在自身建设方面也会出现许多执政前所没有的问题。针对党的作风上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多次告诫全党要保持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并结合整风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和整党建党工作以及其它实际工作,在党和国家机关以及各级干部中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反对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的斗争,果断解决了贪污腐化分子刘青山、张子善。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毛泽东反复强调,必须实行党的民

主集中制。毛泽东还多次强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必须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努力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

权力离开监督就会产生腐败。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如果没有来自人民群众的监督，同样会丧失先进性。毛泽东指出，我们进行执政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自觉接受来自人民群众的监督，“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⑤为此，1950年4月党中央做出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将党和政府的领导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同时，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了发挥民主党派和人民政协的监督作用。“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⑥

执政能力是执政党有效履行执政使命的重要保证，也是执政党先进性资源的重要来源。如何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角色转变，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学会领导经济建设工作，重建与发展国民经济，是建国后党所面临的严峻考验。为了应对这种考验，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要学会建设一个新世界，这就要求提高各方面的能力，尤其是经济建设的能力。毛泽东多次强调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都要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执政能力不仅包括经济建设的能力，还包括民主法制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社会建设等方面的内容。就法制建设而言，毛泽东深知法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要制定社会主义宪法和其他法律，搞我们自己的一套法律体系。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陆续制定了《土地改革法》、《婚姻法》、《工会法》、《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等一系列的法令、法规，有力地支持和保障了建国后各项政治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五四宪法”的诞生，毛泽东亲自担任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主席，主持起草工作，不仅对内容的规定而且对文字的表述也作了极为认真地考虑。据统计，从1954年至1957年仅中央一级就颁布了430多件重要法规，使无法可依的状况大为改变。^⑦

四、可靠保障：努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政权稳定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家的完整统一，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强大的国防。新中国成

立后，中国共产党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为出发点，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从而使新生政权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军事战略方针是党和国家根本性的军事政策，是从全局上谋划和指导武装力量建设及其运用的总原则、总纲领。建国之初，针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采取得严重敌视政策，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积极防御，巩固国防，与帝国主义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保卫国家安全的战略方针。在这一战略方针的指导下，一方面，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保家卫国；另一方面，开始努力提高自己的国防能力。

军队是国防力量的主体，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首先是通过军队的战斗力体现出来的。军队现代化首要的标志就是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为此，抗美援朝时期，我们就花费大量外汇从苏联进口先进武器，从而为最终赢得胜利奠定了基础。但是，进口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军武器装备落后的状况，而且我国财力有限，也不可能长期依赖进口。从长远看，军队要真正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必须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正式仿制苏军武器，逐步实现了武器装备国产化。自力更生不但使我军在20世纪50年代现代化水平获得提高，而且增强了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后劲，为后来我军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有了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还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新中国成立初期，解放军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这种状况与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很不适应。为此，1950年8月，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随着新军兵种的相继建立和部队武器装备的不断更新，加强解放军战术技术训练日益紧迫。从1952年起，全军掀起了以学技术为主的军事训练热潮。为了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对干部的需要，1950年6月，中央军委决定改建、新建一批军事院校。到20世纪50年代末，我军各类院校已发展到120多所，共培训干部30余万人，基本形成了诸军兵种院校齐全，初、中、高级院校衔接的军官培训体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我国经济力量、科学技术和工业基础都很薄弱的情况下，毛泽东高瞻远瞩，果断作出了发展我国国防科技事业，走科技兴军之路的决策。他又多次号召要搞技术革命，强调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我军“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

西。”^⑧在1955年1月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正式通过了着手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研制核武器的决定。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国防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取得了重大进展。

五、重要条件:积极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一个新生政权要想得到巩固,还涉及到国际社会对该政权的认同问题。“一个国家能够从其他国家获得越多的外交承认,它就越能维护它的主权和合法性。”^⑨因此,积极发展对外关系,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是新生政权巩固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开始考虑如何处理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旧外交、构建新型外交关系的问题。为此,首先确立了“另起炉灶”的方针。1949年1月,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⑩不承认旧外交,不表明新政权不想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中国共产党是希望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鉴于国民党集团盘踞台湾和霸占联合国的中国席位,新中国制定了同外国建交的三条具体原则:凡愿与我国建交的国家必须同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集团断绝外交关系;对新中国采取友好态度,支持其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通过谈判证实其尊重中国主权的诚意。

由于世界各国对新中国态度有所不同,中国共产党在争取国际承认的问题上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积极争取它们的承认。建国前,毛泽东就说:“我是想要到苏联去,要求他能带个好头,承认我们的新政府。……成立联合政府,不仅国内要做好准备工作,在国际上也要做好准备工作。”^⑪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中公开提出了“一边倒”的方针,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一边。新中国成立后,没有经过谈判就迅速与除南斯拉夫以外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与苏联结成了同盟关系。对于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承认问题,则提出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根据上述原则

与方针,到1956年底,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就已达26个,还同两个国家建立了代办级的“半外交”关系。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承认,表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新政权在国际社会获得了合法性。在国际关系中,如果一个国家具有较高的政治合法性,在国际社会权力运作中受到的阻力就小,收益就大。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承认,特别是中苏同盟的形成,从而在艰难的条件下,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

注 释

- ① 《刘少奇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1页。
- ②④⑤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5—496、498、500页。
- ③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页。
- ⑥ 张明军等:《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分析》,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 ⑦ 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8页。
- ⑧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页。
- ⑨⑬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9、147页。
- ⑩⑪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40、387—388页。
- ⑫ 王长江:《中国政治文明视野下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
- ⑭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4页。
- ⑮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0—291页。
- ⑯⑰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27页。
- ⑱ 李安增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79页。
- ⑲ 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 ⑳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 ㉑ 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05—106页。

[责任编辑 王建国]